



月亮走我也走

决策参考

本期专题 · 地方债

- ◆ 中央高度重视地方债黑洞 审计署详查政府性债务

政坛经纬

- ◆ 领导人都是比喻大师

八面来风

- ◆ 上半年经济工作亮点频现 改革红利持续释放

历史深处

- ◆ 相逢晚辈关注大陆

悦读时光

- ◆ 毛泽东自称三本书让他信仰马克思主义（二）

盐城市图书馆

2013年7月第10期

〔总第399期，半月刊〕

盐城市图书馆火热的夏天

高考状元面对面



毛泽东自称三本书 让他信仰马克思主义（二）

述期间，陈望道拥有两大公开的宣传阵地。要数最大的是扬名全国的《新青年》月刊，陈独秀即被陈独秀任为编辑，积极推动马克思主义宣传，深受赞誉。1920年11月，陈独秀调赴广州工作，陈望道接替起编辑主编的重任。八卷五号开始，他对自己认真负责，为便于工作，将自己所住地搬到了陈独秀寓所。楼上是《新青年》编辑部，楼下是当时上海党建小组的办公室。陈望道称：他和参加编辑工作的李锐、施存统、李达等，天天眉头青训问题”。他非常注意坚持纠正原有的优良传统，但又着手进行一些适应形势的改革。一项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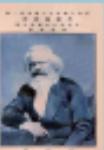
举措，就是对稿件采取某种党章态度。当时的《新青年》已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了，但仍然认为对原有作者的一些不同思想倾向的稿子，可以加以删改。这既可以扩大影响，使他们反过来，又可以在舆论高压政策下，起掩护作用。《新青年》正增辟了《俄罗斯研究》专栏，着力宣传十月革命后苏维埃俄国不断发展的新成就，鼓舞人民奋勇投身俄国革命的道路。

另一份刊物便是基地是《民国日报》的副刊《觉悟》。该刊的主编是与陈独秀同为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成员郭大力（陈普居深家），他们相互合作得很好，那就时陈望道代为编辑。在当时激烈的“思想斗争中，《觉悟》备和《新青年》并肩战斗。不同的是，《新青年》打的是实力派的“胜地战”，而《觉悟》副刊进行的是机智灵活的“游击战”。陈望道在和我们谈话时称：“我们常利用它来进攻激进性的战斗。”《觉悟》副刊，发表许多马克思主义新思潮的文章的30余篇。《觉悟》进行的马克思主义宣传，不着意发表系统

性专论，而是注重从社会实际生活的体验中，从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探讨与争辩中精心编定，参与者大多为学校教师和知识分子。文字朴实，通俗易懂，社会影响很大。

■ 关于上海第一个共产党组织的名称——陈望道提到“内部叫共产党”

在创建中国共产党期间，上海出现的第一个组织，就是1920年5月成立的“上海共产主义研究会”。是年5月，陈独秀召集包括俞秀松、李汉俊、陈望道等人开会，决定成立上海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定名为“中国共产党”。然而，长期以来，我们的书刊上却往往称其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或挑其性质称“共产党支部”，避用“中国共产党”称呼。有张伟南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史话》一书中说，但其正文仍称“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如胡绳的《中国共产党约七十年》一书就沿袭这样。近来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发现早在今夏上述1920年8月会议时，就称“取名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一词消失了。这是我所见的第一次，这种尊重历史事实的精神，令人赞赏。陈望道是1920年8月会议的参加者，当然知道其组织定名为“中国共产党”这一情况。可是，他在和我们谈话中却未提及，只是讲了一句“内部叫共产党”，也算透露了一些实情。



“上海共产主义研究会”。是年5月，陈独秀召集包括俞秀松、李汉俊、陈望道等人开会，决定成立上海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定名为“中国共产党”。然而，长期以来，我们的书刊上却往往称其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或挑其性质称“共产党支部”，避用“中国共产党”称呼。有张伟南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史话》一书中说，但其正文仍称“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如胡绳的《中国共产党约七十年》一书就沿袭这样。近来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发现早在今夏上述1920年8月会议时，就称“取名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一词消失了。这是我所见的第一次，这种尊重历史事实的精神，令人赞赏。陈望道是1920年8月会议的参加者，当然知道其组织定名为“中国共产党”这一情况。可是，他在和我们谈话中却未提及，只是讲了一句“内部叫共产党”，也算透露了一些实情。

（未完待续）

盐城市公共数字文化培训班



少儿辩论赛



（本版图片摄影为易路杰）



编者按：审计署官方网站宣布：“近日，根据国务院要求，审计署将组织全国审计机关对政府性债务进行审计。”此前，审计署先后两次组织对地方政府性债务进行了审计。业内人士认为，这次审计署并未强调“地方”，预计将对中央和地方政府性债务首次进行全面审计。

7月18日，“汽车之都”美国底特律向法院申请地方政府破产保护。底特律债务极其庞大，有180多亿美元的长期债务和数十亿美元的短期债务，是目前美国规模最大的城市破产案。底特律破产案再度给中国一些过度举债的城市敲响警钟。

“中国究竟有多少地方政府性债务？这个连地方政府自己都说不清。只有全面的政府性审计，才能给政府债务管理提供更充分的信息。”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杨志勇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

实际上，在中国，地方政府性债务已经成为和房地产泡沫同样引人担忧的风险，甚至有人担忧中国某些地方政府因为过度举债而面临破产危机。

中国地方债知多少？风险有多大？我们能否将风险控制在安全的范围内？……这一切引起国人关注。

值此审计署“雷霆行动”之际，本刊推出“地方债”专题，供各位领导参考。其他栏目的文章祈盼得到您的关注。

本期专题·地方债

- 02 中央高度警觉地方债黑洞
- 审计署详查政府性债务
- 03 专家解读地方债审计：
- 政府不会破产 养老不受直接影响
- 06 中国地方政府财政堪忧
- 06 当政治成为摩天大楼的驱动力
- 08 “花传到这届政府手上”

政坛经纬

- 11 领导人都是比喻大师
- 13 “两会”后人事调整第五波：
- 7省市 11位政府副职履新

八面来风

- 15 上半年经济工作亮点频现
- 改革红利持续释放

历史深处

- 19 胡适晚年关注大陆

悦读时光

- 封三 毛泽东自称三本书让他信仰马克思主义（二）

主 办：盐城市图书馆

刊头书法：臧 科

主 编：刘 进

责 编：周玉奇

地 址：盐城市城南新区府西路6号

邮 编：224005

电 话：0515-69971581 18961988622

邮 箱：75156450@qq.com

网 址：www.yctsg.cn

设计制作：盐城市圆融数字印刷有限公司

中央高度警觉地方债黑洞 审计署详查政府性债务



“近日，根据国务院要求，审计署将组织全国审计机关对政府性债务进行审计。”国家审计署网站28日挂出的一条短消息，瞬间传遍市场，释放出强烈的信号地方政府债务“黑洞”已经引发中央高度警觉。专家认为，地方政府的违规融资行为将是此次审计的重点，同时乡村一级政府债务情况也有望纳入审计。

有媒体报道称，审计署目前已开始培训，并将于8月1日起全部进点《经济参考报》记者就此于28日联系审计署，询问其对全国政府性债务进行审计的具体时间表以及步骤措施等相关事宜，不过，审计署新闻处相关负责人表示，“工作还在进程中，没有更多信息可供发布。”

政府性债务包含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以及一些其他相关债务，尤其是一些地方融资平台公司的债务。对政府性债务进行全面审计并非第一次。审计署曾于2011年3月至5月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5个计划单列市本级及所属市(地、州、盟、区)、县(市、区、旗)三级地方政府(以下简称省级、市级、县级)的债务情况进行了全面审计。结果显示，截至2010年底，除54个县级政府没有政府性债务外，全国省、市、县三级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共计10.7万亿元。此后，审计署并未进行过全国性的政府性债务审计，而在2012年11月至2013年2月间，审计署也曾对36个地方政府本级2011年以来政府性债务情况进行了审计。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今年7月首次公布其

对中国政府债水平评估称，2012年广义政府债务(包括中央和地方预算内及未列入地方预算内的，如地方政府基础设施建设支出)已超过GDP的45%。而据渣打银行日前发布的《亚洲债务大起底》报告估算，截至2012年末中国政府债务占GDP的78%。虽然不少国内或国外的机构给出了各种估算，但目前政府性债务规模并无官方的权威统计。

“中国究竟有多少地方政府性债务？这个连地方政府自己都说不清。只有全面的政府性审计，才能给政府债务管理提供更充分的信息。”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杨志勇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有业内人士表示，地方政府债务期限结构如何，以哪些方式筹借，偿债率多大，履约记录如何，由地方政府债务形成的资本运用情况如何，所投资的项目是否能自行维持债务偿还与周转，这些都需要权威的统计。

中央财经大学财经研究院院长王雍君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指出，“此次政府性债务审计是全国范围的一次摸底，我估计会比2010年的地方政府债务审计更彻底、更全面，主要是看2010年以来地方政府又新增了多少债务。”有媒体报道称，不同于2010年的三级地方政府审计，此次审计署将对中央、省、市、县、乡五级政府性债务进行摸底调查，新增了对乡村一级债务的审计。针对五级政府审计的说法，审计署新闻处相关负责人并未予以证实，不过在业内专家看来，这种可能性非常大。一位接近财政部的人士曾对记者表示，“在一些乡和县，地方

政府财政和债务问题非常严重，特别值得重视。”

“应该说，现在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较为集中。但是，风险到底有多高，能不能转化为危机，会不会失控，我们现在还没有一个完整的统计渠道。”王雍君告诉记者“现在关键的一步就是识别、预警，看哪里有危机。审计的重点将是对违规的审计，比如违规担保、违规借款、债务资金的违规使用等。通过这个过程了解地方政府的债务究竟有多少，就可以为预警提供宝贵的信息。”

而市场则担忧此次审计将对市场产生“地震式”的影响。光大证券曾预计，今年下半年到期的中国地方政府融资工具（LGFV）约有人民币1270亿元（合210亿美元），几乎等于上半年627亿元的两倍，规模为2000年以来最高。海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表示，从市场角度看，地方债的风险非常大。他进一步解释道，“地方政府常通过借新债还旧债，审计进入后，对资金来源查得比较认真，举新债不那么容易了。如果不让借新债了，那么旧债的偿还压

力就比较大了。这种风险是普遍性的。”不过，李迅雷也指出，和地方融资平台相关的银行贷款、企业债券、信托产品都会受影响，产品的发行规模可能会减少，不过其他方面的影响应该不大。

实际上，在中国，地方政府性债务已经成为和房地产泡沫同样引人担忧的风险，甚至有人担忧中国某些地方政府因为过度举债而面临破产危机。如何才能彻底化解地方债危机？杨志勇指出，这需要制度性的改革“要解决地方政府性债务的问题，不能靠堵，只能靠疏导。所以，要逐步放开地方政府自行发债的权力，只有债务更加透明，风险才更容易防范。现在已经有6省市进行了自行发债试点，但规模还小，未来需要进一步扩容。”杨志勇说。

王雍君则指出，“地方政府不问责债务、问责政绩。官员出政绩的方法很简单，就是借钱。等要还债的时候领导已经调离或者晋升了。债务问责机制的漏洞不容忽视。”

（7月29日 《经济参考报》）

专家解读地方债审计： 政府不会破产 养老不受直接影响

7月18日，“汽车之都”美国底特律向法院申请地方政府破产保护。底特律债务极其庞大，有180多亿美元的长期债务和数十亿美元的短期债务，是目前美国规模最大的城市破产案。底特律破产案再度给国内一些过度举债的城市敲响警钟。

2011年，审计署对地方政府性债务全面审计发现，截至2010年底，除54个县级政府没有政府性债务外，全国省、市、县三级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共107174.91亿元。

2012年至2013年审计署对地方政府性债务的“抽查”结果也不容乐观。

这两次审计结果，审计署均向全国人大常委会进

行了报告，也向社会进行了公告，引起各方高度关注。今年6月，一些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员在审议审计报告时提出，地方债风险不容忽视，关键要摸清底数，



加强监管。

审计署审计长刘家义代表国务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审计报告时建议，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进一步清理规范融资平台公司，抓紧建立和完善地方政府性债务规模管理和风险预警机制，实现对地方政府性债务的全口径管理和动态监控。

全国审计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审计学会理事、清华大学会计研究所教授郝振平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称，可能正是因为国内地方债问题持续发酵，以及国际上底特律正式破产等国内外问题的双重刺激下，才促使国务院正式要求审计署开展新一轮大规模、而且全方位的政府性债务审计工作。应该说，国务院也是希望通过此举发挥审计部门的免疫功能，防患于未然，将可能因此对居民和企业产生的一些不良影响降至最低水平。

□ 地方债现状

16 地方政府债务率超 100%

审计署 2013 年第 24 号审计结果公告透露了 36 个地方政府本级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如加上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2012 年有 16 个地区债务率超过 100%。其中，有 9 个省会城市本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率超过 100%，最高的达 188.95%，如加上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债务率最高的达 219.57%。不仅如此，14 个省会城市本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已逾期 181.70 亿元，其中 2 个省会城市本级逾期债务率超过 10%，最高的为 16.36%。

这一公告的发布引发出关于“16 个地方政府可能因资不抵债遇到破产问题的质疑”。美国底特律市破产后，这一疑问又被部分网民提起。

审计署有关部门负责人曾坦言，目前我国存在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增长较快，部分地区和行业债务风险凸显，债务偿还过度依赖土地收入、高速公路、政府还贷二级公路债务规模增长快、偿债压力大、借新还旧率高等问题。

解读：“底特律破产”不会有中国版

中国的地方城市政府会不会也出现破产？郝振平解释说，由于美国的政治制度，才会出现地方城市政府财政方面资不抵债后，中央政府不予援助，而任

其破产的问题。他认为，国情不同，这种情况在我国应该不会出现。鉴于目前我国财政整体财力还是处于增长区间，而且财政收入总额巨大。即使地方政府资不抵债，甚至出现运转困难的问题，中央政府也绝不会袖手旁观，而肯定会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等兜底方式救援相关地方政府的。

若输血地方债影响民生投入

虽然地方政府破产的情景在我国应不会出现，但郝振平强调，地方债规模增长较快及资不抵债等问题都会对社会经济产生极大影响，绝对不容小觑。

他介绍，地方债无序增多，产生最重要的问题其实就是会加大企业和个人的税收负担。地方政府举借的债务，大部分要通过地方政府收取的税收加以偿还。借得越多，就相当于预支了今后更多年的地方税收。一旦贷款、信托，乃至违规集资等方式的偿债压力加大，很难保证地方政府不会通过收取过头税费等方式来筹措资金，加重企业和个人的税收负担。为救助地方政府，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和其他方式援助地方的资金，无疑主要来源也是税收。一旦中央财政这类支出增多，关于民生和社会经济正常建设的投入就会相对减少。

养老金发放不会受直接影响

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看，美国等国像是父子已经分家单过，因此地方债对地方居民的影响极大，会出现地方政府一旦破产，居民在社保、公共资源享受等方面受到一系列直接的严重影响。郝振平认为，我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则像是父子仍是一家子，每天还在一个桌子上吃饭，所以只要中央政府“有粮”，地方政府就不会真的“挨饿”。

郝振平分析，在我国，不论是居民的养老金发放，还是行政事业单位职工的工资发放等民生问题，都有财政兜底，不会直接受到地方债问题影响。我国也不会轻易开为增加财源而新设税种的口子。目前，国务院也多次提出，并实际减免了一些企业的税收，减税应该是个政策趋势，这方面个人和企业也不用过于担心。

成因：向银行贷款搞发展

郝振平介绍，改革开放后，地方债逐步出现，其成

因多种多样。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出现“收入上移、支出下移”的趋势。中央财政收入加大,地方在财政收入相对缩小的情况下,事权却加大。但地方政府如何“搞钱”?除了卖地,就是举债。为满足发展需要,一些地区向银行直接贷款或以土地抵押等方式质押贷款。这是至今为止,地方债最主要的来源。地方债投入的最主要领域,无疑就是基础建设方面。

在上世纪90年代前,一些国企已经资不抵债,但政府部门考虑到职工利益等因素,通过政府注资或接管企业债务等方式,也增加了一些地方债额度。不过上世纪90年代之后,这种情况基本绝迹。

另外,一些地方早期曾发行“经济建设公债”,后逐渐演变为由财政部代理发行,或自主发行的地方债。这也成为地方债的一大来源。

近年,一些地方还通过信托、BT(建设B移交)和违规集资等方式变相融资,这也是一些筹资成本高,蕴含新风险隐患的地方债。

三类地方债

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地方政府(含政府部门和机构)、经费补助事业单位、公用事业单位、政府融资平台公司和其他相关单位举借,确定由财政资金偿还,政府负有直接偿债责任的债务。

地方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因地方政府(含政府部门和机构)提供直接或间接担保,当债务人无法偿还债务时,政府负有连带偿债责任的债务。

其他相关债务: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经费补助事业单位和公用事业单位为公益性项目举借,由非财政资金偿还,且地方政府(含政府部门和机构)未提供担保的债务(不含拖欠其他单位和个人的债务),政府在法律上对该类债务不承担偿债责任,但当债务人出现债务危机时,政府可能需要承担救助责任。

截至2010年底全国地方债 10.7万亿

2011年全国审计工作会议曾透露,全国审计机关4万多人对全国省市县三级地方政府性债务进行了全面审计,涉及部门机构单位8万多个、项目37万多个和债务187万多笔。截至2010年底,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10.7万亿元。

今年6月审计署发布“2013年第24号审计结果

公告:36个地方政府本级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显示,截至2012年底,36个地方政府本级政府性债务余额3.8万亿元,比2010年增加4409.8亿元,增长12.94%。

郝振平分析,目前我国省市县三级地方政府性债务应该不会超过20万亿元。

对话:临时举债投放应经人大审议

京华时报:地方债到底按哪种统计口径计算?

郝振平:无论部门统计口径有何不同,我都建议采用最简单、也是最大的口径,就是无论举债方是谁,最终是要由地方政府保证偿还的那些地方债务。因为只有最大限度地统计地方债数额,才更有利于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

京华时报:地方债的安全范围是什么?

郝振平:目前地方债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虽然各地举债额极大,可关于地方债却没有一个健全的风险评估和安全评级体系。由于各地当前经济实力、今后发展潜力等各方面因素均不同,所以像广州这样的省会城市和不发达的省会城市,其地方债预警比例绝对不会相同。

因此,国务院和全国人大应在地方债风险评估和安全评级体系方面强化合作,无论是以人大立法方式,还是国务院规章方式,都应尽快出台一个相关指导体系。

京华时报:地方债合理的投放领域有哪些?怎样有效控制地方债规模?

郝振平:我认为合理的投放领域只有两个。一个是符合地方政府明确规划,并确定下来的投放领域和相应金额。另一方面,对于规划外的临时举债和投放,都应该经过人大部门的审议。只有当地人大部门认可举债理由和举债规模,对此形成决议,当地政府才能举债。不应该轻易赋予一些政府部门自行举债和投放的权力。

由于我国税收增速已经严重放缓,国内外经济环境使得企业发展步履维艰,而土地财政又属于不可再生的有限资源,因此一定要通过人大和审计等多部门合作,以加强立法、审议,以及审计动态监督等方式,尽量控制地方债的增速,使其规模逐步趋于合理。

(7月29日 京华时报记者 赵鹏)

中国地方政府财政堪忧

中国的审查员们肯定忙碌了一个周末。中国财政部部长楼继伟上周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称，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长目标是 7%。经过审改后，这个数字成了 7.5%——与目前的官方目标相符。今年第二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速从第一季度的 7.7% 放缓至 7.5%，看起来还会进一步放缓。这似乎表明，楼继伟当时是不小心说漏了嘴。如今，确保这一放缓不会导致经济崩溃是中国政府的首要任务。

中国政府主导的流动性紧缩，以及约束中国影子金融体系的指令，正在直接损害经济增长，这是因为许多企业和地方政府依靠这个体系获取资金。然而，如今有很大一部分资金只是为了偿还旧债的利息。中国大部分固定资产投资是通过地方政府建立的信托基金和发行债券融资的，今年这些信托基金和债券发行量增长了不止一倍，而固定资产投资却只增加了五分之一。中国地方政府贷款已高达 10 万亿元人民币，与 GDP 之比为五分之一。

其他获取资金的渠道也在萎缩。由于产能过剩导致利润和税收下降，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正遭遇

沉重打击。房地产市场一旦面临困境，地方政府通过卖地筹集财政收入的能力也会大大降低，而土地是地方政府很大一部分融资的抵押物。《中国投资参考》(China Confidential) 指出，以内蒙古自治区为例，今年头五个月的财政收入增长持平——远低于其 14% 的增长目标。

没错，中国企业的股价看起来很便宜。中国四大银行中，三家银行的股价低于账面价值——四大银行的总市值占了恒生指数(Hang Seng index)逾六分之一权重。中国银行(Bank of China)如今的股价只有账面价值的 0.7 倍。不过，就像中国的 GDP 数据一样，账面价值也可能被多次下调。

(7月16日 英国《金融时报》Lex 版专栏是由 FT 评论家联合撰写的短评，对全球经济与商业进行精辟分析。译者/何黎)



当政治成为摩天大楼的驱动力

2013 年 7 月 20 日，远大集团投资兴建的一座名为“天空城市”的摩天大楼在长沙举办了基础部分的开工仪式。这座造价约 90 亿元的高楼计划在 2014 年 1 月完工。到那时，它的高度是 838 米，比现在的世界第一——迪拜的哈利法塔(Burj Khalifa)还高出 10 米，这也意味着其将成为新的世界第一高建筑。

假如远在迪拜的哈利法塔知道“天空城市”这个

项目，那么其一定会长舒一口气，渴望被尽快取代。因为当哈利法塔在 2009 年施工中超过台北的 101 大厦，成为世界第一的时候，迎接它的不是荣耀，而是羞辱：它和世界上唯一的 7 星级酒店一起，见证了迪拜房地产泡沫的破灭。

当时，迪拜的房地产市场经过了 6 年的繁荣，在 2008 年达到顶峰。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后，迪拜楼市泡沫破灭，房价到 2009 年已经下降了 50%。在这

个背景下，2009年11月26日，迪拜最大的国有投资公司——迪拜世界(DubaiWorld)，提出延迟6个月支付260亿美元的债务。消息一出，世界股市大跌。迪拜世界，这个对阿联酋最重要的投资公司，当时负债590亿美元，占阿联酋800亿美元负债的四分之三，这是自2001年阿根廷债务重组以来最大的国家债务违约。

实际上，自从1887年世界第一座摩天大楼在纽约建成以来，几乎每次摩天大楼的修建过程和经济或金融泡沫的破灭都存在近乎诡异的相关性。具体来说，纽约20世纪初的两座最高大楼，胜家大厦(Singer, 187米)和大都会人寿保险(Metropolitan Life, 247米)，在见证了1907年的金融危机大恐慌后，于1908年和1909年分别完工；20年后，世界最高的三大建筑，华尔街40号(40 WallStreet, 283米)、克莱斯勒大厦(Chrysler, 319米)和帝国大厦(Empire State, 443米)，于1929-1931年间建成，见证了美国股市与楼市破灭以及经济大萧条；1973年建成的世界贸易中心(World Trade Center, 526米)和1974年建成的西尔斯大厦(Sears Tower, 527米)，见证了美国

1970年代的滞涨；1997年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市中心建成的双子塔(Petronas Towers, 452米)，见证了马来西亚和周边国家的亚洲金融危机；台湾的台北101大厦(508米)是在高科技泡沫破灭后完成；迪拜的哈利法塔(828米)，作为世界最高大楼，见证的是过去十年最大的国家债务违约。

为什么摩天大楼的修建常常和泡沫破灭联系在一起？因为制造这些世界高度的原因往往不是住房或办公室紧缺，而是信心爆棚；这样的事情也常常在信贷宽松、资本市场和楼市高歌猛进时发生，所以世界高度常常是盲目投资的指标，预示着灾难。

不包括长沙的“天空城市”，现在世界上最高的十座摩天大楼中，中国大陆已经占了四座。在世界上正在动工的一百多座摩天大楼中，超过一半位于中国。更要命的是，根据巴克莱的研究，正在修建的摩天大楼中，超过80%发生在中国的二三线城市。

实际上，在这些在建的摩天大楼后，都闪烁着地方政府的影子，“天空城市”也不例外。地方官员需要业绩，需要“世界第一”来为自己“增光添彩”。因此在这种政治目的的驱动下，摩天大楼如雨后春笋般的在全国拔地而起。

当长沙“天空城市”动工的消息传来，网上流传的多是对建造技术的置疑，但一系列在经济上不可忽视的问题是：世界第一高楼需要诞生在长沙这样一个远离金融中心的城市吗？在这个中国经济放缓、信贷增速减慢、债务风险加剧的时候，“天空城市”的前景如何呢？当政治目的成为兴建摩天大楼的驱动力时，经济效益多半会被忽视，那么这些摩天大楼会不会和前文中提到的那些地标性建筑一样，成为一个时代经济泡沫破裂的见证者呢？

或许，摩天大楼遍地开花的局面代表着我们正处于一个“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的状态中。

(长江商学院副院长、金融学教授 陈龙 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本文编辑 霍默静
mojing.huo@ftchinese.com)



“花传到这届政府手上了”

——访中国中小企业协会会长李子彬



在国企、政府和中小企业协会的任职经历，以及与许多高层官员的熟稔关系，让李子彬对当下中国改革的现实路径作出了自己的判断。（CFP/图）

“看戏容易演戏难，改革不是容易的事。得有突破口，得挑重要又容易做的先做。要改，也要讲究策略，有轻重缓急，把握节奏力度。”

“这届政府很难，很多多年积累下来的问题，击鼓传花到他们这儿了，不改不行了。”

2013年7月13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小企业投融资交易会期间，73岁的中国中小企业协会会长李子彬拨冗接受了南方周末的独家专访。采访开始前，他不紧不慢地放下手中那款黑色摩托罗拉老式翻盖手机。

一个月前，李子彬写了一封信给国务院副总理马凯，反映中小企业的一堆难题。2013年7月15日，国务院召开全国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经验交流电视电话会议，马凯在会上的一系列指示，与李子彬

在信中所写的许多内容吻合。

“并不是我的信起了多大的作用，只是大家都想到一起去了，这些问题是本届政府必须面对和改革的。”李子彬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说。2013年5月23日，他向主管工业、交通和金融业的副总理马凯汇报“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两人聊了一个多小时，马凯让他回去专门写个材料。三周之后的一个周末，出差归来的李子彬用8页稿纸，手写了一封近五千字的信。马凯阅后，批示转给央行行长周小川、银监会主席尚福林和证监会主席肖钢等，与正在讨论的改革措施“一并研究”。

“学者的建议有时太理想化，实现不了，政治家要讲究怎么做可行。”李子彬说。

李子彬与多位现任国家和政府领导人熟稔，比如他曾在习仲勋家里吃过6顿年夜饭。而其任职经历，更让李子彬深谙在中国改革的现实路径：他大学毕业后进入工厂车间，“从锅炉工干起”，一路做到国企厂长、化工部副部长；小平南巡后被调到改革开放前沿深圳主持工作6年，其间帮助举办高交会并使之成为深圳向高科技与创新经济转型的重要载体；60岁时调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任专职副主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直至65岁。

退休后，在包括马凯在内的“朋友们的鼓动”下，李子彬创建中小企业协会，目前已有会员二十多万人。这几年，他“每天朝九晚五地上班，但一分钱工资不拿”，自称“专门为中小企业解决麻烦”。

“不重视中小企业，社会不稳定，老百姓富不起来。”李子彬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中小企业面临的环境不好，也不坏

南方周末：从2006年创建中小企业协会以来，您一直跟中小企业保持着紧密接触。近几年中小企业的现状和生存环境是否有改变？

李子彬：每年我都走十几个城市调研，我感觉有进步。经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很多企业家都懂得了必须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增强风险意识，培育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培育品牌，不然经不起大的冲击。危机有好的一面，经过这一轮的洗礼，中小企业整体素质有提高。

中央各项政策也正在出台，银行对中小企业的贷款余额没有减少反而在增加，资本市场上发债、上市、私募股权基金等融资工具都在增长。

南方周末：融资是中小企业最大的难题之一，近年是否得到改善？您如何看待中小企业面临的整体环境？

李子彬：还是困难。虽然融资环境、融资条件比2008年那时候改善多了，但还是满足不了中小企业的需求。

为什么困难？金融危机造成的国际经济低迷还没有过去，世界经济复苏还有难以预料的困难。市场需求下降，各国的贸易保护措施就多，所以贸易摩擦与壁垒明显增加，加上人民币升值使得我们出口产业竞争力削弱。从国内来看，消费需求没有明显的增长，名义消费增长率约14%—15%，剔除通胀大概也就12%，多年来如此。投资拉动也变化不大，固定资产在投资里占22%左右，多年也如此。因此经济增长的三大动力——出口、消费和投资，都没有大的明显的利好。

不过也没有太大的过不去的困难。有人说现在是经济危机山雨欲来，那是瞎说，不可能。整个经济形势，只能说是不好，也不坏。

但我们的财政风险和金融风险确实在积累。比如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规模到底多大，有人说10万亿，有说18万亿，有人说25万亿，到底多少谁

都不知道，但确实在增加。影子银行大概在22万亿。房地产泡沫还没挤呢，现在经济下滑又有人主张要加快发展房地产，说它关系到二十多个行业。靠房地产拉动，其实是饮鸩止渴，因为房地产空置率已经很高。但我们又不敢太挤压房地产泡沫，它用的都是银行的钱，自己的资本金30%都不到。调控力度太大，把它搞垮了破产了，银行的钱也没有了，我们是国有银行，那就会引发金融危机了。

南方周末：6月17日给国务院副总理马凯的那封信，您具体提了哪些建议？

李子彬：简单说提了四条：一、改变现有银行业体制、机制，改善中小企业的融资环境。在国外，企业70%的融资来自直接融资，比如发债、上市等，只有30%是通过银行的间接融资。而在我国正好相反，70%的金融资产都掌握在银行手中，企业融资主要靠银行，中小微企业只有5%是直接融资。大银行不愿意给小企业贷款，这是从风险和成本来考虑的，它没有内在动力机制，谁当行长都一样，国外也是大银行按基准利率批发给小银行，大量的社区银行等小银行服务小企业。中国没办法，没有小的，只好让大银行捏着鼻子给小企业贷款。

二、大力发展中小银行。我算了一下，全国两千多个县，将近四万个村镇、社区，平均一个县一家中小银行，五个村镇社区一家中小银行，就有1万家中小银行可以服务中小企业。我建议未来十年建1万个小银行。有没有依据？有，美国就有8000家银行，香港1000家银行，我们这么个国家没有3万家根本不够。

三、鼓励民间资本做中小金融机构。与其让民间资本搞地下钱庄，不如让它们成立规范的银行，为民营企业服务，便于监管，风险也小。应该降低民营银行门槛，同时建立存款保险制度，降低风险。

四、规范和加快发展资本市场，完善直接融资。我们已经有了中小企业板、创业板，还要推出新三板，还要允许中小企业发中小企业集合债、集合票据等；也要大力发展股权投资、风险投资、

私募股权、融资租赁等。银行再怎么发展，也不能满足不同发展阶段的公司的资金需求，有的阶段也不应该由银行满足。比如高科技企业三四个人，刚成立没业绩，没抵押资产，没信用记录，老百姓土话说“成葫芦还是瘪葫芦都还不知道”，银行怎么贷款？这本来就需要股权融资、风险投资等的介入，让企业以股权换资金。两轮融资以后企业发展起来了，才跟银行贷款或者上市，规律就是这样。

我这几条都是从现实中总结出来的，是能做到的。

改革是唯一的出路

南方周末：在您看来，中小企业面临的经济形势为何会形成今天这种局面，如何破局？

李子彬：这十几年产能过剩，特别是落后产能过剩，越来越严重。

这是体制上的问题，地方政府有责任。为官一任要保发展、保稳定，这都要钱，中国没几个省市财政是自己能拿钱出来搞建设的，保吃饭都有问题，都靠中央财政返还和转移支付。地方政府没钱，还要干事情，还要造桥修路，就只有卖地搞房地产。没有地方政府的推动，房价也不会这么高的。搞土地财政钱还不够，就搭建融资平台借钱，我们300个地级市有8000个融资平台，搞不清借了多少钱。

跟这种财政体制有关系，也跟干部的选拔、任命、考核机制有关系。比如一个厂的落后产能过剩，关了几十亿税收就没了，几万工人失业，几百亿GDP没有了，几个领导敢关？还有的干部，挣钱的本事不大，花钱的魄力很大，比如有的银行，培训基地不少于30个；医院也搞成五星级的，号称给干部疗养。所以现在要反对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奢靡之风。

南方周末：这一届政府现在已经提出了包括金融改革在内的一些改革措施，您怎么看？改革的动力来自哪里，前景如何？

李子彬：这届政府很难，很多多年积累下来的

问题，击鼓传花到他们这儿了，不改不行了。

产能过剩不是现在过剩，是15年来的过剩。说让消费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推动力，收入分配制度不改革，消费怎么拉动？金融体制也要改革，不然金融体制与实体经济、结构调整两张皮，跟小微企业脱节。科技教育体制不改革也不行，诺贝尔自然科学奖中国人没有，因为人才成长环境跟人家没法比，我孙子上小学就作业做到晚上9点，这不改行吗？有人说中国过10年就超过美国了，我看50年能赶上人家就不错了。我们比人家不是差一个档次，创新能力不能比，人家3亿人，我们13亿人，总量赶上人家算什么，人均还差4倍呢。中国人要清醒。

我一直跟我认识的中央领导讲，改革是唯一出路，不改革好多问题解决不了。你老讲加强宏观调控，钢产能你怎么调控不了？一个河北省就3亿吨产能，人们说全世界钢产能中国第一、美国第二、河北第三，在眼皮底下都调控不动。

现在体制上的弊端太多，只有改革才能解决问题。这届班子都从基层上来的，比较务实，年龄也合适，我对他们有信心。

南方周末：您怎么看待改革的节奏与重点？

李子彬：各项改革齐头并进也不现实，得有突破口，得挑重要又容易做的先做。要改，也要讲究策略，有个轻重缓急，节奏力度的把握，看戏容易演戏难，外国行的事儿，照搬到中国可能水土不服。

金融改革现在已经在做了，我大胆预测一下，收入分配改革今年不动明年也得动，这个改革非常复杂，但早晚得过这坎儿，躲不过去的，不能说上个十年不做这一届还不做，再不做就有崩盘的风险。

结构调整也得一点点来，先把增量卡死，存量慢慢消化。得有步骤，中国的事儿急不得。李瑞环以前开玩笑说，中国的事儿快不得慢不得，急不得缓不得，有点道理。

南方周末：您在深圳当市长时期，推动了很多改革，特别是产业升级转型，您怎么看待今天的经济转型，改革路上要注意什么？（下转第11页）

领导人都是比喻大师



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时用了两个引人注目的比喻：“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着才知道。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最有发言权。”中俄双方把握这美好的早春时节，为两国关系和世界和平辛勤耕耘，必将收获新的成果，造福两国人民。”

这位青年时代插队并操持农活多年的中国领导人打比方时充满浓厚的泥土气息。他的比喻风格朴实而简单。习近平曾经就干群关系打过这样一个比方：

（上接第 10 页）

李子彬：当年小平南巡，我们每年都研究如何真正地改革，每年一次会，所以改革不断推进。我在深圳提出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搞结构调整，是全国最早的，搞了两年之后上海和北京才提出来。深圳清理“三乱”——向企业乱收费、乱罚款、乱集资，1996 年就搞完了，有个省“三乱”问题前年才解决；

“如果群众不听（党的政策），你就先跟着群众走，群众跳火坑，你也跟着跳下去。群众觉悟了，从火坑爬出来，最终还是要跟你一起走。”

这样朴实的比喻风格在他的父亲习仲勋那里也有体现。曾经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习仲勋曾把办公室工作比喻为“瓶子口”。因为“领导的决策、指示下达，下边的请示、报告上呈，都要经过这里”。比喻是人类历史上最富智慧含量的才华。贴切的比喻首先来源于细致的观察，其次才是强大的语言能力。

和朴实风格的习氏比喻相比，长于英语的李克强更喜欢用身体语言，这一点和西方人有点类似，他说话喜欢做手势，也擅长用身体设喻。比如 2012 年 4 月李克强作为国务院副总理访问俄罗斯时，用“我们是胳膊肘般的情感”来形容中俄友谊。这个比喻在俄罗斯文化中指的是挽着胳膊肘走路的好朋友。在初任总理的第一次中外记者见面会上，他在回答台湾记者问题时，用“砸断骨头连着筋”来形容两岸的血脉关系。谈到政府改革时他用了“壮士断腕”来形容。而在最近的一次会议上，他提到了“给权力涂上防腐剂”。

1995 年我们搞一站式服务，企业注册一天完成，最慢三天，一家挪威企业还给我们送锦旗。到现在，有的城市注册一家企业得三个月，还要走后门。

深圳的改革有很多好东西，但我们当时搞改革其实挺困难的，不是所有人都给你鼓掌，总有形形色色的说法、看法。

（7月20日南方周末 记者 冯禹丁）

毛泽东是中国领导人当中的比喻大师，他的比喻基本上是用来指导工作，比如《反对党八股》中有“懒婆娘的裹脚布又臭又长”和“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 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的说法，再如对“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作者注：这个比喻的原创是赫鲁晓夫）、“不须放屁”的评点。

当然他也用比喻来交朋友，拉近人与人的距离，北平和平解放之后，他接见傅作义时提到：“我们是姑舅亲戚，难舍难分。”

毛式比喻虽然令人印象深刻，却也带着浓烈的个人色彩，他人很难复制。

比喻同样是展示胸怀、风度和气量的一种形式。长于用比喻描述自己心情的中国领导人首推周恩来。

有一次有人描绘骆驼“坚韧顽强、抗寒抗病、忍饥耐渴、吃苦耐劳。同时它又具有强大的负重力，能长途跋涉，过沙漠，穿戈壁，抵御狂风暴雨，互相团结御敌，直至获得胜利。因而它被誉为‘大力士’、‘沙漠之舟’。依我看，恩来同志就是我们党内和革命队伍的一头骆驼。”周恩来立刻谦虚道：“不，我只是一只小毛驴。”

周恩来曾经勉励记者说：“你们记者，要像蜜蜂，到处采访，交流经验，充当媒介。就像蜜蜂采花酿蜜，传播花粉，到处开花结果，自己还酿出蜜糖来。”

周恩来还曾经用春蚕来勉励自己和身边的人：“我们都要像春蚕一样，把最后一根丝吐出来贡献给人民。”

另一个善于用动物打比方的总理是温家宝，他曾经用“就像老虎”“放出来就很难放回去”来比喻通货膨胀，而用“负轭的老马，不到最后一刻绝不松套”来形容自己。

和周恩来低调谦虚的比喻风格相比，邓小平的比喻则充满自信，大胆辛辣。他善于喻事，比如经典的“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摸着石头过河”以及“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等。

他还曾经把精简机构比喻为“拆庙搬菩萨”、

“消肿”；在严厉打击犯罪时，将大的问题比喻为“就是老虎里头最大的东北虎也要管”；把价格改革比喻为“过关斩将”。更早的时候，在批评游击队脱离群众时，甚至将其描绘为“裸体跳舞”。

江泽民的比喻则和他的兴趣爱好紧密相关，他爱好游泳，曾经在澳大利亚和夏威夷访问时畅游太平洋，在澳大利亚还曾经潜入过海底。他以此比喻说：“我们搞现代化建设，必须到国际市场的大海中去游泳。”江泽民还是一位音乐爱好者，他也以此设喻：“文化应该是健康的，使人精神振奋，又是丰富多彩的，能够满足人们多方面、多层次的需要。进行曲，战斗曲，小夜曲，抒情曲，都要有。”

和热爱钢琴的江泽民不同，热爱京剧的朱口基用起比喻来雷霆万钧、感情充沛，一如打鼓佬七寸六分的两根鼓键子，敲在人的七情六欲上：“豆腐渣工程”、“地雷阵”、“万丈深渊”，都是他担任总理时的高调比喻。

并非什么时候都适用比喻，奥巴马就曾经因为比喻失败而遭遇了不少质疑，2010年，奥巴马在洛杉矶的一个筹款活动上说：“我们疲于奔命、挥汗如雨，而共和党人却只是站在一旁喝着‘思乐冰’冷眼旁观！”后来他又多次提到这款“7-11”便利店的饮料，以至于该公司不得不强调，公司不支持两党的任何一方，但是很乐见总统先生做广告。

除了饮料，奥巴马也喜欢用运动打比方，2012年9月，他曾经用迈阿密热队来形容自己，用林书豪来比喻对手罗姆尼。因为在那之前，热队终止了林书豪疯狂得分的势头。奥巴马的比方其实是想证明自己爱好篮球，但很快，他就遭到了抗议——亚裔人士认为，林书豪是美国梦的代表，他表现不佳的时候需要更多鼓励，而奥巴马把他比喻成要被打倒的对手，是不正确的。亚裔选民投票给民主党的居多，奥巴马不得不大费周章地解释他的本意。

对政治家而言，比喻是一种深受欢迎的才华，用好了可以大大增光添彩，但也是一种难以驾驭的利器，需要新奇、大胆，也需要小心再小心的得体和谨慎。

（博客天下）

“两会”后人事调整第五波： 7省市11位政府副职履新

继几天前孙文魁被任命为天津市副市长后，近期省级政府副职调整密集进行，包括北京、上海、福建、江西、青海、西藏多个省份的政府副职陆续获批履新。

截至目前，此轮政府副职调整已涉及7个省份，地域范围横跨东、中、西部，这也是今年“两会”之后第五波较为密集的省级人事调整。

两“65后”履新青藏

近日召开的青海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五次会议决定接受张光荣辞去青海省人民政府副省长职务的请求，任命辛国斌为青海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此前张光荣已被任命为青海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1965年底出生的辛国斌是黑龙江方正人。1986年从沈阳药学院制药系化学制药专业毕业后到中国医药报社工作。1990年后，先后在国家医药管理局、国家经贸委、国家发改委、工信部等部委工作。

2010年8月，中组部首次从中央选派司局级官员交流到地方任实职，共有54个中央和国家机关部委的66名干部到地方任职。时年45岁的辛国斌由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下派到青海，出任海西州委副书记。第二年5月开始担任海西州委书记、青海省柴达木循环经济试验区党委书记。据媒体统计，首批交流到地方任职的

干部中至少有12位升为副部级，而且主要集中在中西部。

西藏方面，西藏自治区第十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任命姜杰为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1965年10月出生的姜杰1985年从山东大学历史系世界历史专业后，到青岛日报做记者。1991年后进入青岛市委办公厅督察处工作。2011年初，由青岛市委常委、黄岛区委书记调任东营市任代市长，当年底开始担任东营市委书记职务。

京沪闽赣均补齐2副职

在本轮调整中，北京、上海、福建和江西均有两名副省长（副市长）获任。

北京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五次会议表决通过了苟仲文辞去北京市副市长职务的决定，任命戴均良、杨晓超为北京市副市长。今年5月31日，



鲁炜辞去北京市副市长职务，调任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任。7月上旬，经中共中央批准，苟仲文升任中共北京市委常委。

1960年7月出生的戴均良是湖北浠水人，1986年从吉林大学历史系历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后，进入民政部工作。2002年3月开始担任民政部区划地名司司长。2010年7任国家民政部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人事司（社会工作司）司长。去年9月担任民政部副部长。

1958年11月出生的杨晓超是江苏南京人，1982年毕业于北京经济学院（现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系后，先后在北京市财政、地税、审计部门工作。2008年2月开始担任北京市财政局局长。

在福建，福建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四次会议任命中共福建省漳州市委书记陈冬、财政部原部长助理郑晓松为福建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免去倪岳峰福建省副省长职务。本月初，倪岳峰已升任中共福建省委常委兼省纪委书记。

1964年2月生的陈冬是福建罗源人，曾担任共青团福建省委书记、福建省青联主席，2008年起任福建省漳州市委副书记、副市长、市长，2011年2月起任漳州市委书记。

1959年9月生的郑晓松是石家庄人。挪威奥斯陆大学挪威语专业毕业。1993—1996年，郑晓松分别任外交部办公厅副处级秘书、正处级秘书，2000—2004年任财政部国际司助理巡视员、副司长，2005—2007年任驻亚洲开发银行中国执行董事，2007—2012年4月任财政部国际司司长，2012年4月任财政部部长助理、党组成员。

江西方面，江西省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表决任命莫建成、李炳军为江西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接受凌成兴、曾庆红辞去江西省人民政府副省长职务的请求。此前5月，凌成兴已担



任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成员、国家烟草专卖局局长。7月初，曾庆红调任重庆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此前莫建成担任中共江西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李炳军曾任国务院办公厅副主任、朱口基办公室主任职务。

上海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五次会议任命蒋卓庆、白少康为上海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免去沈晓明、姜平上海市副市长的职务。本月初，沈晓明、姜平已晋升上海市委常委。

1959年8月生的蒋卓庆是浙江慈溪人，2002年12月后先后任杨浦区区长、上海市社保局局长、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上海市财政局局长等职，今年3月任上海市政府秘书长。

1962年5月出生的白少康是陕西西安人，1984年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后开始刑警生涯，历任陕西省公安厅刑侦处副科长、科长、副处长，刑警总队副总队长、政委（正处），刑侦局副局长（正处）、政委（副厅）等职务。2010年3月，时任陕西公安厅副厅长的白少康调任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局长，2012年6月任公安部打击整治专项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今年3月，任上海市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助理、上海市公安局局长。

（7月29日 《第一财经日报》）

上半年经济工作亮点频现 改革红利持续释放

2013年上半年，我国经济总体运行平稳，目前仍处在合理区间内运行。但确实也面临着错综复杂的形势，国际经济环境深刻变化，国内经济处在转型期，经济形势复杂多变，一些主要经济指标忽上忽下，还有一些数据之间不匹配，但经济在既有增长的动力，也有下行的压力的背景下，宏观经济和调控政策方面也呈现出不少亮点。

亮点一：经济运行处于合理区间 “上下限”创建明确调控预期

近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248009亿元，同比增长7.6%，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2.4%。

从数据来看，我国经济运行总体上保持平稳，主要指标仍处于年度预期的合理区间（国内生产总值符合今年政府工作报告7.5%左右的目标；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2.4%，也控制在年初预判的3.5%以内），经济结构调整稳中有进，转型升级稳中提质。

当然，我国经济中还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经济环境更加错综复杂，在这样的背景下，要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推进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宏观政策应充分把握好经济运行“上下限”。稳增长为调结构创造有效空间和条件，调结构能够为经济发展增添后劲，两者相辅相成；而通过改革破除体制机制障碍，释放改革红利，为稳增长和调结构注入新的动力。

亮点二：加快转变政府职能 进一步释放改革

红利

上半年中，国务院调整了机构，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还对原来意见和问题较多的铁道部进行了职能分割和企业改制。铁路总公司的成立，也启动了铁路货运市场的改革，为陆地交通和大宗货运市场的改革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

职能转变是新一届政府的第一件大事。从第一次常务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到全国电视电话会议，到履职仅百余天即取消和下放165项行政审批事项，再到中央领导同志基层专题调研；从“把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换成市场的手”，到“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再到“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无论是行动还是语言，都表达出本届政府切实转变职能的坚定决心和说到做到、勇于担当的施政态度。转变政府职能是释放改革红利，促进经济增长的重大举措。正如李克强总理所说，纸上谈兵不如下马服务，要从过去坐等审批转向主动加强为企业基层服务。这样可以促进投资的合理增长，提高经济运行效率，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中央政府会继续简政放权，各地也要放开更多领域和更多经营活动审批。同时也注重和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亮点三：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以开放促改革 调结构推转型

2013年6月，《国家发展改革委贯彻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推进主体功能区建设若干政策的意见》出台，《意见》提出，要明确支持、限制和禁止性政策措施，引导各类主体功能区把开发和保护更好地结合起来。

国家统计局刚刚公布的经济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成为亮点之一。分地区来看，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东部地区同比增长8.7%，中部地区增长10.0%，西部地区增长10.5%。中西部地区工业经济增速“领跑”全国，表明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走过了“东部快速增长、中西部滞后发展”的阶段，体现出区域经济结构的新变化。

我国的区域发展战略中，“以开放促改革”的

思路十分明确。尤其是在“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等优化开发区域，要通过扩大开放释放改革红利，推动产业结构向高端、高效、高附加值转变，提升参与全球分工与竞争的层次，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继续推动区域整体协调，向空间发展要效益。国家战略层面的顶层设计，对区域协调发展构成了强有力的支撑。

亮点四：“营改增”试点全面推开 财税体制改革推动产业结构调整

今年以来，我国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并进一步加快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完善转移支付等制度的步伐。4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自8月1日起将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的“营改增”试点在全国推开，力争“十二五”期间全面完成“营改增”改革。“营改增”是推进我国财税体制改革的“重头戏”，有利于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促进社会分工协作，优化产业结构，推动经济升级，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为服务业的大发展提供助推力。伴随着“营改增”试点全国推开的临近，有关政策措施也相继出台，财政部、央行、税务总局已联合发文，明确试点期中央和地方收入归属不变。针对前期“营改增”试点出现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多发态势，税务总局已提前在全国开展专项整治。

企业是经济运行的细胞，“营改增”拨动了成千上万的经济细胞，实现对经济之躯的激活，这也使得这项改革既有宏观视角，也有微观视野，其对

经济所带来的影响有时可能是潜移默化的，但却是触及主脉的。应该看到的是，这是一项需要锐意进取的税制改革，在改革步伐的不断加快中，其所具有的改革张力也将源源不断地合理释放。

亮点五：盘活财政资金存量 政府带头过“紧日子”

7月3日，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审计后整改工作，研究激活财政存量资金。会议表示，以整改为契机，把挤占挪用的钱归位，把“跑冒滴漏”的钱堵住。特别是要进一步盘活存量，把闲置、沉淀的财政资金用好。

财政投入并不是越多越好，关键在投入的每一分钱是不是去了该去的领域，好钢是不是用在了“刀刃”上。不然，财政投入再多，也只会造成资金闲置或浪费，甚至诱发经济社会问题。在坚持积极财政政策不变的前提下，此次国务院会议强调要把“沉睡”的资金挖出来，这体现了决策的针对性、灵活性、有效性和前瞻性。

进一步盘活存量资金，此举意义更在于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盘活存量资金，把闲置、沉淀的财政资金用好，不会压缩财政在民生领域的投入和支持。恰恰相反，会议强调指出要坚决把扶贫、社保资金等群众的“保命钱”看住。而是要从政府身上“动刀”，以实现“开源节流”。此次国务院会议明确要求各级机关要按照中央八项规定的精神，进一步压缩一般性支出和“三公”经费，政府要带头过“紧日子”。

亮点六：深化金融改革 放开利率管制 利好实体经济

经国务院批准，中国人民银行决定，自2013年7月20日起全面放开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管制。一、取消金融机构贷款利率0.7倍的下限，由金融机构根据商业原则自主确定贷款利率水平；二、取消票据贴现利率管制，改变贴现利率在再贴现利率基础上加点确定的方式，由金融机构自主确定；三、对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不再设立上限；四、为继续严格执行差别化的住房信贷政策，促进房地产市场



健康发展，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浮动区间暂不作调整。

放开贷款利率管制意味着我国银行业的改革又迈进了一大步，也符合“李克强经济学”的内涵。对银行来说，是机遇与挑战并存。未来还想靠息差吃饭的银行，日子会很难过，尤其是缺乏网点优势的中小银行更是如此。谁先做差异化贷款结构的调整，谁先进行利率变化所带来的风险规避的创新业务，谁就能拿到最多的制度红利。

同时，央行全面放开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管制是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重要一步，也是进一步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基础性作用的重要举措，不仅有利于降低企业融资成本，而且有利于增强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更对于经济结构调整与转型升级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亮点七：建设新型城镇化 加快推进棚户区改造

6月26日，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加快棚户区改造，促进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

加快推进棚户区改造，不仅能使千百万困难群众告别“忧居”，也能实现建设“新型城镇化”的目标，还能有效拉动经济增长，扩大内需，带动相关产业发展，为企业发展提供机遇，为扩大就业增添岗位，更能构建“解决低收入难题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多赢格局。棚户区改造不单纯是住房保障问题，还包括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供给，进而形成参与各方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良性循环，成为促进经济转型的有效途径。

对棚户区改造来说，它是一项民生工程，更是一项民心工程，它关系中低收入群体的“安居梦”，也关乎地区的稳定及和谐发展。改造棚户区，是政府义不容辞的重要责任，同时也是加快建设城市建设、提升城市品位的客观要求。这项惠民工程应该尽快破解难题，落到实处，取得成效。



亮点八：促进信息消费 扩大内需新亮点

7月12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研究部署加快发展节能环保产业，促进信息消费，以拉动国内有效需求，推动经济转型升级。根据政策目标，“十二五”后三年（2013—2015年），我国信息消费规模年均增长20%以上。

投资、消费、进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优化投资质量、扩大内部需求、转变外贸方式是当前我国经济转型的重点，利用信息消费的持续性、广泛性、增值性来拉动内需，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权威部门测算，到2015年，我国信息消费规模将超过3.2万亿元。很显然，信息经济成为未来我国经济增长转型的重要支撑点，对我国未来经济发展显得尤其重要。

我国正处于新“四化”同步推进的阶段，扩大内需要创新和拓展思路，既要有效稳增长，又要着力调结构，持续稳中有为。发展节能环保产业，促进信息消费，不仅有利于破解资源环境制约、释放消费潜力，而且会拉动有效投资，带动新兴产业成长，是利当前、惠长远、一举多得的重要举措。

亮点九：扶持光伏产业 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

7月15日，国务院发布《关于促进光伏产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这是近两年来，国务院首次以光伏为命题出台的正式文件。文件提高了2015年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目

标，即达到3500万千瓦以上，2013—2015年年均新增光伏发电装机容量在1000万千瓦左右。这无疑于为国内光伏企业注入了一针强心剂。

这一次对光伏产业的政策扶持，不同于以往由政府推进的单兵突进式的投资扩张，而是将光伏产业的发展与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结合了起来，将光伏产业纳入扩大内需的总体规划之中。在7月3日和12日召开的两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上，都提出了加大对节能环保产业的投入，而光伏正是一种具有很广阔的发展前景的科技创新技术。

就目前来说，提高国内市场对光伏产品的需求是一种更理性的选择，既能够避免与外围市场正面交锋，又能提升内需市场。更重要的是，通过光伏产品在国内市场的推广，可以促进环保节能事业，对于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有重要意义。

亮点十：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新政策新措施陆续推出

2013年5月下旬 为充分发挥民营企业吸纳求职人员就业主渠道作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教育部、全国总工会、全国工商联在全国县级以上城市开展了“2013年全国民营企业招聘周”活动。

2013年5月中旬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做好2013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提出了新的政策措施和工作要求，在财政、税收、金融、就业服务等方面鼓励支持力度明显加大。

2013年3月 国务院办公厅出台《关于建立疾病应急救助制度的指导意见》，针对极少数患者因身份不明、无能力支付医疗费用而得不到及时治疗的现象，提出解决办法，健全了我国多层次的医疗保障体系。

2013年2月 国务院办公厅公布今年第一项“医改新政”——《关于巩固完善基本药物制度和基层运行新机制的意见》，对完善基本药物采购和配送、加强基本药物使用和监管等多方面提出了具体要求。

2013年1月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关于开展社会保险基金社会监督试点的意见》，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积极参加社保基金监督工作，并将在6个省份的部分市县选择监督试点。

今年上半年，按照中央部署，各地、各有关部门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新政策和新措施亮点频现，不仅“看得见”，而且“摸得着”，更注重可操作性与普惠性，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给老百姓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总体来说，今年上半年经济十大亮点都体现出经济平稳运行，市场预期趋稳定的大趋势。只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内，决策层就尽可能不让市场形成政策依赖，同时又让市场感受到政府在政策框架内有所作为。正如社会各界热议的“克强经济学”那样，政府不推出刺激经济的措施、在结构性改革中实行去杠杆化和以短痛换取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潜力。这也意味着未来经济政策更加科学化和可预期：更多地发挥市场功能，同时转变政府职能，削减政府开支，约束政府权力，通过推进全面改革增强经济内生动力，实现经济结构的调整。毋庸置疑，只要中国经济在合理区间内长期持续健康地向前发展，“十二五”计划就能完成，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就会有更大提升，伟大的中国梦就能早日实现。

（7月23日 新华网）



胡适

晚年关注大陆



居中者为胡适

上世纪 50 年代，大陆系统批判胡适思想，胡适都持着“理解的同情”去看待这些亲朋师友的“火力”。同时，并没有因为这些批判而对大陆学术的发展持一概拒绝或否定态度。他不仅利用一切可能给予密切关注，而且只要一看到好的，都会在日记和书信里留下分析与赞扬。

评价钱锺书

目前，读完了《余英时访谈录》，此书内容丰富，收获颇多，但这里只想从他见钱锺书先生说《宋诗选注》说开去。

1978 年余先生回北京，要求见俞平伯和钱锺书，于是在俞家见到了两位先生，他和钱先生谈了钱穆、《红楼梦》、马克思和《宋诗选注》：“我记得我还跟钱先生提到过，胡适看了他的《宋诗选注》以后，曾经说这本书诗选得不太好，但注释都很好。胡适基本上是说钱锺书是天才。”

这段话出自胡颂平先生的《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1959 年 4 月 29 日，“一位香港的朋友托人带来一本钱锺书的《宋诗选注》给先生。先生对胡颂平说：‘钱锺书是个年轻有天才的人，我没见过他。你知道他吗？’胡颂平说：‘十年前在南京，蒋慰堂（复璁）同他到教育部来，匆匆见过一面。他是钱基博的儿子，英文很好。’先生说：‘英文好，中文也好。他大概是根据清人《宋诗钞》选的。’先生约略翻了一翻，说：‘黄山谷的诗只选四首，王荆公、苏东坡的略多一些。我不太爱读黄山谷的诗。钱锺书没有用经

济史观来解释，听说共产党要清算他了。’过了一天，先生看了此书后又说：‘他是故意选些有关社会问题的诗，不过他的注确实写得不错。还是可以看看的。’”

胡适对钱评价那么高，虽然他没有见过钱，同时对宋诗他俩有比较接近的审美情趣和喜好，对此书的选编，胡适是深深理解钱先生的用意的。

“理解的同情”

上世纪 50 年代，大陆系统批判胡适思想，胡适都持着“理解的同情”去看待这些亲朋师友的“火力”。同时，并没有因为这些批判而对大陆学术的发展持一概拒绝或否定态度。他不仅利用一切可能给予密切关注，而且只要一看到好的，都会在日记和书信里留下分析与赞扬。

比如对周汝昌先生的《红楼梦新证》。1954 年胡适生日那天给沈怡的信中说：“周君此书有几处骂胡适，所以他可以幸免，俞平伯的书，把‘胡适之先生’字样都删去了，有时改称‘某君’。他不忍骂我，所以他该受清算算了！其实我的朋友们骂我，我从不介意。如周君此书。”随之他对此书大加赞扬：“汝昌的书，有许多可批评的地方，但他的功力真可佩服。”为此他托人四处买此书，并赠送有关图书馆收藏，“我大索香港市场，买得四册，留两册与台大与史语所”，并常常向人推荐此书，比如对沈怡，《红楼梦新证》已三版，香港可买到，你若没见此书，我盼望你寻一部来看，这是一部很值得看的书”，“你

在曼谷如找不到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可向香港、东京找。”

比如，1956年2月19，“去年大陆上印出了一部《水浒研究》，著者署名‘何心’。此书是一部很好的考证，可以说是结《水浒》研究总账的书。此书有批评我的一些地方，大致都很对。我很想知道这一位新起的《水浒》研究专家，曾写信去托程靖宇访问此人的真姓名。我猜是孙楷第（子书）。但今天童世纲兄告我，‘何心’是陆澹口先生，是项定荣夫人的父亲。当访项君夫妇细问生平。”面对批评，胡适并没有不舒服或者认为自己是权威而强辩，而是坦率承认，同时因为书好，是那么急切地想认识或了解作者。

评《梦溪笔谈校证》

1956年11月18日起一连三天的日记，胡适全是在评胡道静先生的《梦溪笔谈校证》：“大陆上新出的《梦溪笔谈校证》两大册，著者泾县胡道静，可能是朴庵先生的儿子，上海出版公司出版（1956年），一月”，然后遍列此书参考的版本，并给予高度评价：“胡道静校证《笔谈》，功力甚勤，是近日新出的一部好书”，虽然有不少毛病，但功力“确可称许”。

胡适这样做，非常少见，书好是前提，但也可看出胡适读得仔细读得激动。胡适还说此书解决了高梦旦先生也包括他自己在内早年一个注释的困惑与不足：“当年老友高梦旦作十三月历法，‘续言’中曾说他三十年前草‘改历私议’时，曾引沈括‘大尽三十一日，小尽三十日’二语，而后来不记得出于何书。他曾遍校《笔谈》各本，竟不见此二语的全文。我当时也曾助他查检，竟不知此六字只盛如梓引用了全文。其余各本都依据妄删或误删此六字的南宋刻本。梦旦若在，一定很高兴。”

这里顺带介绍一下胡道静先生，朴庵是其伯父，父亲名怀琛，精国学、工诗文，两人均是南社成员，胡道静1927年随顾实等先生攻习国故，1956年春，此书出版后，受到国内外学界的高度赞誉，1959年，北京大学评述新中国成立十年古籍整理工作的成绩，特别提到了两部书，一部是顾颉刚先生主持标点的

《资治通鉴》，一部就是此书，顾先生评价说“有似裴松之注《三国志》，日本学者薮内清誉之为‘当今中国研究《梦溪笔谈》的第一人者’”。这部书为我国古籍整理树起了一道巍峨丰碑。

说余英时先生

胡适日记也说到了余英时先生。他是和余英时先生父亲交谈时说到的。“1958年1月16日，潜山余协中来访，他是用Refugee Act（难民法案）来美国居留的，现住Cambridge（剑桥）。他说起他的儿子余英时，说Harvard（哈佛）的朋友都说他了不得的聪明，说他的前途未可限量。我对协中说：我常常为我的青年朋友讲那个乌龟和兔子赛跑的寓言，我常说：凡在历史上有学术上大贡献的人。都是有兔子的天才，加上乌龟的功力。如朱子，如顾亭林，如戴东原，如钱大昕，皆是这样的，单靠天才，是不够的。”

抗战时，8岁的余英时被送回老家潜山官庄乡，一直到1946年夏天才被此时正在创立东北中正大学的父亲接走，这几年，他仅仅在家乡接受了私塾教育和在舒城、桐城等地接受了粗浅的基础教育，由于内战爆发，1947年夏天考入大学的他也没有安稳地学习，而是很快随着父亲流浪。

此时他受钱穆先生的新亚学院派遣赴美学习，余先生对他当时在美学习有这样的叙述：“第一学年贪多，听了许多不同领域的课”，第二学年哈佛让他改变身份，攻读历史学博士学位，第一年选了欧洲古代政治思想史、罗马史和历史哲学，三门重课“实在吃力”，“可谓糊涂胆大，不知天高地厚”，第二年在这个基础上又增选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等课，吃力如故。

这段话，可以让我们看出，他固然天才，但其成就的取得同样下了“兔子的功力”。他的成功再次验证了胡适的“教诲”。——不知余协中先生回去是否告知这个谈话，如告知了，余英时先生的人生轨迹是不是有着胡适的“暗示”；如没告知，对胡适有精深研究的他后来肯定看到了这个谈话，那时，我想他肯定会对这番话有着会心的微笑。

（7月18日 《人民政协报》）